

歷史對話：性／別 20 年

何春蕤、丁乃非、甯應斌、王蘋

何春蕤

這次是性／別20年的歷史會議，我們在規劃議程的時候就覺得要安排一個特殊的場子，讓一些有20年經驗的老人回頭看一看歷史。性／別作為一個很清楚的女性主義路線，在台灣也奮戰了20年，可能大家心裡也有各種不同評斷，我們總覺得要有點時間讓我們自己來回顧一下，所以今天這一場就是四個老人的自我反省。我們因為事前沒機會商量，所以每個人要講什麼我也不知道。

我是性／別研究室的創始召集人，也是現在還陰魂不散的召集人——何春蕤。還記得2005年性／別慶祝成立十週年，一轉眼又過去了十年。從1990年代女性主義者不敢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女性學者也和婦女運動保持距離，到今日性別議題和女性主義都已經變成很多人個人職涯的加分題，變成她們自稱性別平等專家的晉身階，世界確實已經變了很多。

2005年慶祝十週年的時候，我們把性／別研究室十年的積累都秀出來。那時動物戀網頁官司剛過，我們很慶幸性／別研究室沒有變成保守團體的祭品，所以歡欣的展現了我們的存在和努力。但是今日二十週年，我們面對的局面已經大不相同，保守團體已經變成了進步團體，進步團體則變成了維穩團體，兩者都在性別主流化的大局裡扮演重要而積極的角色。對於這個霸權局面的順利成形、順利運作，我想我們都不得不對自己進行一個反思的批判。以下是我今天對我自己的三個批判。

我的三個自我批判

我的第一個自我批判就是：我很遺憾沒有更早覺察到社運局勢的重大變化。

1990年代我們在後解嚴社會裡搞社運，作為學院知識份子，我們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意識形態的論述爭戰，我們相信，改造社會生活、改造文化意義、改造身體實踐、改造主體情感，都是徹底改造主體、改造社會的重要工作，而且我們充分理解這些工作都需要長時間的耕耘和創新，這也是我把《豪爽女人》寫成專書的目的，就是要長期抗戰。不過，性的議題很容易引發社會爭議，引發不安焦慮，掀起辯論對話，因此我們往往右手要對抗當時壟斷性議題發言的醫學公衛保守力量，左手還要和進步的左翼及女性主義論戰。可是在我們忙於開發思考以便積極應戰的同時，更大格局的變化也正在發生。

性／別的這幾個核心份子可能因為是乖小孩、好人出身，所以從來不太覺得「法律」會和我們有什麼關連；當時社運的取向聚焦於挑戰政府威權，對「政策」也不屑一顧。然而我們沒有意識到，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冷戰結束，國際政治重新洗牌，全球化經濟也順勢積極佈局，在這個大脈絡之內，台灣國族定位的僵局與文明現代化的成熟，都促使「硬統治」逐步轉型成為「軟治理」，台灣民主進程所形成的兩黨博弈則為NGO的角色創造了新機會，可以積極參與國家治理，讓自己成為內政和外交上的玩家。從這個歷史發展來看，1997年公娼運動時主流廢娼女性主義者宣布，以體制內改革取代邊緣戰鬥路線，真的是很徵兆性的改變。這個趨勢和它創造的正當性後來帶領更多NGO興起，透過在關鍵的事件上和聳動的媒體唱合，煽動性恐慌，讓越來越多法律得以堂而皇之的侵入我們的生活領域。

各種防制條例、通報系統、監視系統逐漸成形時，我們渾然不覺，直到政策雷厲風行，執法後苦主大量出現，我們才恍然大悟，並開始螳臂擋車的努力組織抵擋的力量，可惜效力始終很局部，很有限。這20年來新設置的許多法律，從兒少法、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家暴防制法、性侵害防制法、性騷擾防制法、煙害防制法、愛滋防治條例，以及刑法的各種擴張和修訂，都擴大了管制和監控。然而這些

法律的順利設置，也不能只歸罪於保守團體，畢竟主流進步團體若是沒有默默認可，若是曾經出手和我們一起阻擋，很多立法修法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輕鬆而且充滿正當性的通過。換句話說，所謂進步自由派團體的歷史業障，也到了需要清算的時刻。

我的第二個自我批判就是：我太早撤出了女性情慾的戰場，沒有繼續深耕。

1990年代台灣的女性情慾解放運動，據說我是創始者（聽眾大笑）。20年後看這個運動是成功還是失敗，取決於你去看哪些方面的改變，我想很多人會有自己的答案。我個人倒不是用成功／失敗來想這件事情，而認為它是「未竟之功」，也就是還沒有做完的事業。這個運動或許為很多乖乖女生創造了所謂「身體自主的安全空間」，她們可以穿低腰緊身牛仔褲、低胸T恤、超短的熱褲短裙，展現身體和慾望，甚至現在還可以義正詞嚴的解放奶頭而不至於遭到媒體和社會的全面追殺。但是那些真正觸及性道德基礎的彎彎劈腿、劉喬安賣淫、小雨參與火車趴出現時，我們立刻就會看到女性身體自主的正當性仍然力有未逮，真正挑戰父權保守道德的女性還是繼續被放逐被懲罰，這也是性權人士總是會在這些議題上積極戰鬥的意義所在。

這個「未竟之功」當然主要是因為我們的人力和能力有限。1994年開啟的女性情慾解放運動只進行了短短兩三年，一個迫切需要支援的妓權運動就吸引了我們大部分的精力，從1997年開始，性／別研究室全力投入生產知識資源支持公娼的妓權抗爭，各位可以看看我們從那個時候開始，出版了多少和性工作相關的專書、文章，包括進行專題研究、主辦主題會議。同一時期，同志運動完全不被主流女性主義所關注，我們性／別研究室則積極串連邊緣，主辦會議，出版專書，為這個新的運動創造正當性和知識基礎，我們主辦的「四性研討會」就是第一個正式以同性戀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年輕的朋友可能有所不知，以前性／別研究室每年主辦的四性研討會就是同志公開出櫃的首選場域。（聽眾大笑）

不幸的是，進入2000年代，我個人先是捲入了兒少性交易防治條例第29條侵犯人民言論自由、違法兒少人權的辯論和抗爭，接著爆發

動物戀網頁連結事件帶來的司法苦戰，再也沒有多餘的精力回到女性情慾解放論述。我當時想，為更邊緣的性而戰，或許也會帶動女性情慾得到更大的空間和正當性吧，當然這個假設日後證明是錯誤的。缺乏具體的耕耘，徹底的改變就很難到來。最終，有助於改變台灣國際形象的同志議題有了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和書籍論文，而對於女性情慾，特別是無益於優勢女性分享政治權力和資源的女性情慾，仍然嚴重的缺乏相關的知識建構，這也使得我們在面對整體異性戀情慾體制（特別是婚姻議題）的時候，沒有累積起更多更有力的批判武器。這個重要的工作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是否還有精力再度拾起。

第三個自我批判就是：我雖然批判逐漸形成的政治正確氛圍，但是也不得不反省是不是自己過去也曾助長了政治正確氛圍的創造。

過去幾年，我寫了很多批判文明化的文章，因為我越來越意識到，政治正確的正當性主要建立在文明化的可欲和優越上，也就是積極肯定某些普世價值是超越階級和地域和族群的文化差異的，因此必須成為全民共識，所有人都必須接受。在台灣的社運語言和成規裡，批判也好，抗爭也好，多半都需要舉出比一般常識更為神聖、更為崇高的普世價值，以維持正義姿態，贏得民心，也因此，人權、平等這種普世價值一直熱力不減。我想，我們在很多強弱對峙的抗爭情勢中往往也會使用這種策略，擺出神聖的被壓迫者態勢，表現正義與邪惡對立，在這樣的二分法思考中就簡化了複雜的現實，鞏固了正邪之分、對錯之分，這是我們需要反省的。

還好，出於「性」本身的不入流、不文明性質，我們並沒有侷限於文明化的運動策略。1990年代的抗爭行動很少考慮是否文明，事實上，反抗的主體在面對體制權力的神聖不可侵犯時都會有很大的衝動要惡搞它——「惡搞」本來就是溢出原來的範疇、進入不敬不雅不文明的領域，而不是像現在多半只是好玩好笑而已。再加上在抗爭裡很快就覺悟，「溫良恭儉讓」的美德和理性協商只是回歸統治者的邏輯，是用來約束被壓迫者的工具，因此當時的不馴反抗一心一意要用最衝撞的方式攪擾常識，挑戰權威。大便、露體、衛生棉、性器官、三字經、政治不正確的惡搞，都在這段時間裡大量衝入神聖的學術和

政治殿堂，完全不用脈絡和情境。比起318學運場上，女性學者還需要說一番大道理、批判完性別不平等之後才覺得有正當性能講出「幹」字，1990年代主體對文明化調教和規訓的抗拒非常強，隨口都說得出「幹」來。

我還記得1996年我在彭婉如命案的恐怖氛圍中公開發講「防暴三招」，也許你們在網路上讀過這篇文章，但是那次演講是以實地演練為主的，可惜沒現場錄影。當時我沒有建議女性鍛鍊自衛術或者避免出門，這些理性的自保措施或花拳繡腿救不了女性，我反而主張女性要積極學習替男人打手槍讓強暴者卸甲歸田，或者在日常生活裡苦練手勁一舉狠狠捏破強暴者的蛋蛋，或者大哭坐地發瘋發狂撒尿塗臉讓強暴者噁心害怕。這三招沒有一招是平和的、優雅的、文明的、理性的；相反的，它們是暴力的、瘋狂的、不怕性的，因此也不可能接合政治正確的說法而被神聖化。然而就當場聽講的數百女學生的反應來看，這種不文明卻有著強大和徹底的主體改造力量。

說真的，我們活在一個權力技術越來越高明的時代，我們越來越難看穿「友善」「關懷」「尊重」「多元」等等進步價值如何虛偽的掩蓋了殘酷的壓迫現實。這也使我們必須努力認識從國際到在地的權力勾結和價值粉飾，切實反省羞恥、厭惡等等文明情感如何塑造了我們的自傲自信，也構成了我們對他人的嚴厲和傲慢，我們更需要擁抱可恥而真實、隱密而狂放的身體和慾望。這也是此刻我個人還在努力推動的事業。謝謝！

丁乃非

我今天要回到25年前的台灣。25年前的台灣激進女性主義地下小團體讀書會「搥角度」，從部分書單以及書單小部分文章的翻譯出版歷史看來，詞藻超乎內容，言過其實。這是徵兆，不是第三世界的通病，而是權力的經濟與政治大重組的日常微小扭節點。從我這個團員的角度回看，這些卡卡的地方，在當時的團體閱讀與討論內部，反映了知識不足又急於診斷病因。搬來的知識資源必然來自另一個時空，那個時空自身的危機時刻（美國1960、1970年代）生產的論述。

歪角度的歪有個提手旁。當時英文字想的是askew，aslant。中文，決定讓它有個提手旁，搞出來不正，歪的感覺。不正，在每個成員不斷說的那些自己的故事裡頭好像無所不在，每個成員或個人或成群結隊的往後也帶著這些故事的影子，生活中做出各式不同的、不正的行徑與知識。這些起初的不正究竟是如何轉變成爾後新的、威力十足的正義凜然？當初聚集起來，雜燴著的各種不正的想法、心情、慾望、言語、作為、政治、不正當、不正經、不正確、不政治，如何在後來的十年之間長出了政治正確，以致釀成新的性別道德與壓制、懲罰？

失敗，怎麼說？

讀書會的書單，我負責的部分，看得出1980年代台灣留學生面對的美國女性主義論述初步建置化的文字身影。當時美國學院文科第一代的專業學科女性主義論述萌芽，美國學院論述和草根運動激盪，黑人民運、婦女運動和女性主義、女男同性戀研究和酷兒研究，這是美國脈絡從邊緣向中心、下往上而來的連續挑戰與衝擊。大學與學科，知識的建置機構，被迫面對自身的權力與盲點，在我所念的文學批評領域裡，性別與性、種族與階級的無意識得以現形。文字和思潮在學院中流竄和發酵，往後十年，在不同的學科，以不同的速度發生作用力量，進入所謂知識主流化的進程。倒過來說，就是邊緣知識專業化、學科化、建置化。文科的女性主義、性別政治與酷兒研究，就是在美國1980年代到1990年代將近十年間，藉出版與會議集結，眾志成城。

當初的書單，從現在看來，見證了1980年代美國婦女運動正升起、尚未但瀕臨四分五裂的影子（兩造，從來不只是兩造）。激進的女同志女性主義作家們分別提出反帝、去殖、解資本主義的性別、性與種族的批判，我們也閱讀得津津有味。這些文章面向社會而非僅學院，慷慨激昂，作者群多不是學院中人，也因此，文章的言語修辭憤怒與激勵參半，多用全稱等絕對的語句辭彙。有些文章有著儉約的文藻，正適合去脈絡化的翻譯／閱讀。翻譯／閱讀指的就是閱讀英文文

本同時中文講說的時候，看似直接翻譯內容，卻同時去除了文字本身（媒介）層層的歷史地理政治鑲嵌：父權就是父權，男性女性全世界都差不多，就是男尊女卑。文字不僅透明，甚且單薄。文字的物質承載（層層脈絡之餘，還有解碼的文類文法機制）任意削減消音（為了時間，為了好讀，為了快速凝聚情感作用；就我自身而言，也有知識不足的問題）。那時，詞藻超乎內容：強加翻譯的「中文」超乎足以落地的意義與知識內容。

掙角度的讀書會當時沒有反思望文生義之效。我們閱讀，連結到自身，波及旁人親友，文字的女人都是女人，都是自身，都是我們。我們就是我，我就是我們，沒有脈絡的翻譯文字，讓人人都處在抽象的想像個人處境中。這是一種特定的閱讀法，從字面上閱讀的方法（a literal reading）。聽似具體，其實抽象。

掙角度的書單，是一種留美回國的台灣1980年代末期女性知識青年的冷戰主體徵兆。她／我以為自己就是（生理）女性，因而成為個人化的看似獨立人，同時又是一種全稱。團體內部不是沒有巨大的差異，各式各樣的差異，但是意識覺醒的部分，差異恰恰支撐著同意與相似。閱讀內容的脈絡是美國，當時的閱讀多自動自然以台灣來置換。這是以美國為軸心，以台灣為經緯的閱讀方式，美國與台灣也就成為不自覺的一體兩面。此國與家，沒有過去，指望未來。成功的形式和路途，已經有譜。

婦女新知在1990年代初期舉辦過一個座談，有一位後來顯示為親綠的成員當時很抽象的說，對她而言，國家問題先於性別，婦女運動不可以不先談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這是不可迴避的。到了1997年，公娼抗爭辯論期間長達一年的各種密室討論會，另外一位成員說她從小就住在公娼館的附近，說出被誤認賣淫的憤怒與害怕，還有房子地產因為性污名無法增值的苦。又有人質問，「她們」哪一點算得上女性主義，言下之意，這麼妥協的人生。

我兩種情感都有，民族國家，以及自身就是最珍貴所屬物、住家是財產之感情。與前兩位發言的內容卻有不同。從1990年代被定義過時、封建、壓迫與殖民的舊的民族國家（中華民國），銜接的是上個

世紀初期的革命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情感，可能暗示家內隔代傳遞的情感（亦即外省第二代），或是以自由台灣為座標的反共民族主義（冷戰自由民主陣營）。父執輩根深蒂固的銜接上個世紀初期反清反帝反殖民的民族主義感情，我和它（這種民族主義）和他們（家族老人）的關係不銜接，從小在國外嚮往「回台灣」，回台灣上中學時被迫升旗竟起雞皮疙瘩，到後來又愈趨反感反抗，開始蹺課跳舞卻沒有膽量蹺家。終至研究所，與左翼朋友廝混，對於社會運動啟蒙，回台灣後參加掙角度和《島嶼邊緣》的1990年代初期。

當時，上個世紀初期，遙遠的，不好奇不理解的中國內戰與流亡，無限延宕的，壓抑又膨脹的家與國的感情，我以為我拒絕、否認它們。當然，後來發現，拒絕者到底為何物，根本不曾面對理解。空洞的拒絕，註定回返。否想的民族國家竟是內戰延伸的一體兩面（所謂國共）。

後來，王蘋和我合作主編一期《島嶼邊緣》，那一期的名稱就是被塗銷的、影子化的國，影射家與國是假的，認同也可以或往往是做出來的。自小在家在校的「被」家與國，以此否想為假。公娼抗爭，假家國（兩個國不只兩種家）內爆了。婦女新知那位成員的發言，到1990年底已經匯聚為無言共識。一位女界領導人在公娼抗爭期間下了指令，婦女新知需要清理門戶！另一位近來出書的說，當初恨不得拿個大掃把把這些〔支持公娼的工作人員〕掃出去。民族國家打造與新的性別秩序、性別主流化的一體兩面，到1990年底，顯示為預言，匯聚為共識。

最近才有重新認識公娼抗爭的資源，穿透仍然冷戰的掙角度書單，閱讀蓋茲的台灣與四川民族誌研究，理解兩種糾纏。一是農家與小資產商家，女人和小男人的勞動力從宋元以後就是家族延續以及家族與國家（稅收）協商之間的緩衝物，不論是買賣或是轉給他人使用，女人和小男人幾乎同樣好用、有用。這裡的嫁娶、妾室和婢女、娼妓，一線之隔。這種習俗（所有的習俗都是有來歷的政治勢力與經濟作用的相互穿透交織），隨著明清往東南亞的世代遷徙，持續到二十世紀。台灣也不例外。底層勞動力的依循家庭需求，被或是自我

商品化，行之有年，也在民族誌處處記載。公娼，作為台灣1970年代工業化的底層女性，經濟與文化資本讓她成為公娼，同時可能單親媽，或是別人家的小的。我如果沒有記錯，知名婦女政治人物也曾寫到，小時候因為家庭經濟而差一點被送給人家寄養。這在家族之內，家族之間，不特殊於台灣。

公娼作為經濟強制轉型而被剩餘的人們，就像公娼自救會會長官秀琴說的，她沒有當上律師是因為欠栽培，這個社會國家欠她。這個「欠」，部分來自政治和經濟修辭與制度的冷戰知識斷裂，家族底層的勞動力不斷被向外扔出或者自我拋售，而且在我們這些地區的壓縮工業化、加速原始積累的爆裂過程裡，持續被獨攬性別平等之名上而下的向上提升遮蔽、遮羞。於是，公娼成為過去的代名詞、受害者，而不是持續的資本主義化遇到新的家與國打造機制的「被」剩餘。這些是當年從地下讀書會到參與婦女新的一連串密閉會議無法認識說出的，或者是那個時候連問都問不清的問題。我現在稍微能說，也還得繼續問。

卡維波

我們好像都在講錯誤，老人講他們年輕時候犯的錯，對年輕人也是好事，他山之石總是可以攻錯的。

性／別二十年知識生產的批判性回顧

每個個人和他的知識資源都是沒法脫離時代的制約的。回首我們這幾個資深的性／別研究室成員的時代制約，應該要從比較大的政治脈絡來講。我們幾個可以說是「洋左」，那我就從洋左這種人說起。所謂洋左就是相對於土左而言，土左在1950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中被徹底鎮壓了，19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以台灣加工出口區為標誌的資本主義發展以及保釣運動又產生了新的土左，就是像陳映真這一類，後來他們就跟舊的土左接上，形成台灣所謂的左統派。相較之下，我們這些洋左多半沒有保釣經驗，是在海外特殊的環境裡成形的，在當時社會主義國家倒台、冷戰結束的這種環境下回到台灣，我們這些洋

左就慢慢形成一種文化政治上的左派，在文化政治上形成一種文化激進主義，如果講根源，也可以回溯到五四的文化激進主義所形成的一種反傳統觀、世界觀。那個時候洋左很多人集中在《島嶼邊緣》這類刊物裡，某種程度上，性／別研究室大概就是屬於這樣一種文化激進主義或者激進派。

但是在文化上其實還是有保守派跟自由派。自由主義當然也是從政治脈絡裡來的，從民國時期就存在的自由主義之中，比較反對國民黨的留在了大陸，但是比較反對共產黨的去了香港、美國，或者影響到了台灣，於是就慢慢催生了反對國民黨的政治自由主義。另一方面，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操作，也造就了反傳統的現代主義與個人自由主義文化，所以催生了台灣在文化上的自由派。不過從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它是保守的自由派。大家都知道自由派有兩種，一種被稱為保守的自由派，一種被稱為進步的自由派，台灣因為時代限制，戒嚴之下只有保守的自由派。文化上的保守自由派在政治上則是反對國民黨的，而且跟文化上的保守派是不一樣的；換句話說，大家要分清楚「保守的自由派」不同於單純的「保守派」，前者是自由派，後者是保守派。你們要是不懂兩者的區別，我用個例子來講：保守派是反對同性戀的，保守的自由派則是會容忍同性戀的，但是不像進步的自由派不止於「容忍」而可能還會更進一步積極作為。在解嚴以前，台灣的文化主流是保守派，而不是保守的自由派。

所以，在我們這些洋左回台灣的後解嚴時代，有保守派，也有自由派，這兩者是互相衝突的，保守派從主流的地位逐漸退下，自由派則開始成為主流。在這種過渡時期，所謂的「主流」有時意味著保守派的舊主流，有時意味著自由派的新主流，不過別忘記，當時台灣的自由派是保守的自由派，這些保守的自由派在主張女性主義的時候不會有那種邊緣的激進性，因此他們會反對性工作，反對何春蕤的豪爽女人，要跟性解放劃清界線等等。不過，這些逐漸成為主流的自由派女性主義比較不太願意碰邊緣議題是有一個原因的，就是因為在政治上傾向綠營而想走大眾的、選舉的路線，去拉婦女的選票。同時因為選舉要講政績，要看得見的成果，所以立法、由上而下的制度作為就

成為主打的路線，立法方向則是偏向中產階級或符合主流的要求。這是保守派與自由派在性別領域的共同點與合作面。激進派則會反對社會文化領域的密集立法。

現在大家都知道，在女性主義或性／別方面，保守的自由派和激進派的衝突，最後形成了所謂的婦權和性權的分家。不過這樣的名詞分類也會造成誤解，因為就像洪凌提醒的，婦權不是沒有性，性權不是沒有性別。

上面講保守、自由、激進在文化政治上的三國鼎立，但是大家要看到：「保守的自由派」跟「保守派」之間有某一種接近性，有共通的「保守」元素。你們也許會說：喔，所以她們都是壞蛋？嗯，我們都不是小孩子，不要用善惡去分析世界。「保守」其實就是保存的意思，就是不要把舊的丟掉，寧可緩慢的改變。

剛剛我們講的自由派要進入文化主流和選舉政治，這看似是台灣內部的因素，不過台灣總是被外部因素所制約的，我們不能只談內部因素，而忽略外部因素。大家都知道1960年代開始，中蘇交惡、美國聯中抗蘇之後，美國要重新布署亞太區域，韓國和台灣都必須走向民主化，韓國是用暗殺的方式，台灣的黨外運動則被蔣經國強硬抵擋下來，這都是1979年的事。最終美國還是成功地讓台灣變成選舉民主國家，因為只有這樣，台灣才能取得新的正當性——本來台灣存在的正當性是代表中國，如果1949後台灣不代表中國，西方或國際社會便沒有正當性支持蔣政權，因為台灣在二戰後是歸還中國的，不能說1949年台灣被一個軍政府盤據因此台灣就不屬於中國了。照道理來說，台灣只能代表中國才能生存，因此，台灣與大陸的對峙意義就是中國內戰，而國共內戰在冷戰期間的真正意義則是中美之間的戰爭，也有人說是美俄之間的代理戰爭。中美建交後，台灣要有新的存在正當性才行，所以唯有台灣轉變治理方式才能重新布署由美國主導的局勢。特別是冷戰結束，美國推翻蘇聯和東歐，可是卻沒有在1989年拿下大陸，台灣的地緣政治地位因而又開始有微妙改變。無論如何，台灣的治理方式或國家機器的重新打造，同時就是重新打造國族，這個在《島嶼邊緣》雜誌時期便講得很清楚了，還把丘延亮的原句改

寫成「營造台灣國族（nation-building）以打造台灣國家機器（state-building）」，當然反過來說也成立，這到今天還是一樣。

任何一個要打造民主的國家，除了民族主義之外還需要排除內部的邊緣，把社會中沒有辦法教化的、不文明的這一類刁民去除，這是一種「內部綏靖」。有刁民存在，任何民主政體都會動盪，所以你要有所謂的中產階級的壯大。當守法律、守秩序的人是多數時，你才能形成民主政治，所以就得要培養何春蕤寫過的「嬌貴的情感公民」等等。這個時候，我們就看到保守派積極的推動密集的兒少立法，有時是道德恐慌下的鎮壓立法，創造出緊急狀態或者例外狀態來壓制某些公民原有的權利——有些人不夠格做我們的同胞，因為他們搞援交、搞戀童、傳染愛滋病，這些人的公民資格必須被排除。這種例外狀態的「嚴打」同時也強化國家權力、鞏固主權。不論是粗糙或細緻的兒少婦幼立法，它們所建構的保護弱者話語還會溢出到動物或甚至自然，由此製造出來的文明感覺、嬌貴情感、規範話語繼續打造公民。當然這種纖細敏感的文明化公民情感不容易出現在下層階級，因為後者沒有足夠資源，由此可見，人人有獎的公民資格內其實隱含了階級秩序或階序。在這段時期（2000-2012），保守的自由派其實蠻配合保守派的，這是類似「左右共治」的時期，自由派雖然表現自己是進步的，但是並沒有要去抵抗保守派的立法，兩者反而共同維護了我所謂的「新道德主義」。

台灣在打造了選舉民主的民族國家體制以後，我們激進派和這個體制仍有很多衝撞，但是治理技術在這個時候也在轉變，這就是國家與社會或者NGO協同治理的開始，大約在2000年左右開始吧。國家雖然還是壟斷暴力，但是我們看到由於身體私領域的商品開發而帶來社會的複雜深層化，國家監控能力明顯力有未逮，不能只靠嚴打的亂棒齊下，所以國家其實是和公民社會共同合作，塑造一個自動自發、自我監控、自我規訓的主體。這種協同治理通常是採取權利交換或者福利交換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要權利或者福利，那麼你必需是某類公民主體。好比在愛滋個管的例子裡，不只是因為愛滋生病以及外在的環境而使得這樣的主體願意被監控、被個管，而是因為在個管中有安全

感，有很多的照顧與福利。

透過上述的新治理方式，台灣國族與國家打造過程中又使得自由派與保守派都產生了更進一步的變化，特別是在台灣反對黨總統選舉失利的2012左右開始的趨勢。這一年在政治上，美國總統歐巴馬連任，在（伊斯蘭）文明衝突甚至戰爭、或與中蘇新冷戰的全球局勢下，更積極地向國內外推動文明進步主義。事實上，在2012之前美國的自由派就已經有這樣的勢頭了，我這裡不分析細節了，否則會離題。總之，台灣自由派與保守派都產生了進一步變化，現在自由派已經不需要是保守的自由派，他可以變成進步的自由派，也就是從「保守的自由派」變成「進步的自由派」，而且可以吸納性權的很多議題或口號，召喚性公民，這種性運團體則成為性公民團體。

自由派從保守變成進步，這樣的變化使得原來的保守派更形分裂。原來居於領導地位和自由派「共治」的、分享主流權力的保守派變成了「進步的保守派」，就像勵馨基金會也可以說「我很關心同志、我也很贊成同性婚姻」等等，這種進步保守派在口號或形象上都快要併入自由派了。但是另一部分的保守派就被拋在後面，越來越失勢，不再是主流了。雖然她們還有一些力量，但是在整個大環境中是失語的，被認為是與時代脫節的，這些主要是宗教團體，有時被當作是基本教義派或原教旨主義。她們在反對同性婚姻時，因為危機意識、誇張話語與積極行動，往往表現出一種激進性，你可以稱為激進的保守派。因此，台灣的文化政治從「保守派－（保守）自由派－激進派」的格局，轉變到「（激進）保守派－（進步）自由派－激進派」。

現在吸引媒體和群眾關切的主要是「進步的自由派」與「激進的保守派」之間的鬥爭，特別是在同性婚姻的議題上。同時，我們也看到一些看起來理應算是激進的口號和作為（這不等於激進派），但是其實現在所做的這些事情並沒有像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中期那樣的衝撞。像「解放奶頭」這樣的活動要是換了在當年，衝撞力就會很大。當年有個研究生混入風月場所當端茶小妹，上了報紙頭條，有大學生在戶外跳表現身體的熱舞，也上了報紙頭條——不是蘋果日報那

種方式，而是當作文化抗爭的性解放現象。然而現在呢？你可以說整個社會氛圍已經改變了，不過我覺得更準確的說應該是：大家都知道現在的抗爭者都是有底線的，是會自我約束的「公民」，否則就會失去正當性。即使看來激進的抗爭者，不也是愛台灣嗎？大家都必需團結在台灣共同體（制）下。總之，看來激進的抗爭者也無法有太大影響力，因為他們只是多元中的「一元」，也無法影響其他多元，而且這些少數彷彿被其他人團團圍住，處於很嚴密的監控下，少數人出不了什麼亂子，不會影響到主流，這就是如今衝撞力道不強的意思。今天早上游靜說，在過去的文化操作裡，婦女被去性化，而現在婦女團體或是同性戀團體都不是去性化，而是去「壞性」化，你可以有性，但壞的性就要排斥出去，可以保留好性。這種情況下的性激進抗爭不會有很大衝撞力的。壞的性，就和統派什麼的一樣，不會見容於台灣公民社會的。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自由派與保守派之外的激進派當然需要轉變。那麼，我們贊成還是反對同性婚姻？綠色生態？動物保護？這種簡單的「贊成／反對」是把你困在封閉櫃子裡的思考方式。2012年在我和何春蕤合著的《民困愁城》，我們就在做「出櫃」的思考。這本書的宣傳詞是「社會批判理論的逆流之作」，講到「社會建構與改造有其限度」、「追求文明道德進步有其黑暗面」，這顯然不是激進派的語言或思考方式。過去激進派表現為「比進步自由派還要進步、還要自由」，這不是我們的取向，因為這還是困在櫃子裡。在這本書的〈序言〉裡，我們注意到pinkwash、greenwash等，呼應我們從2010年起的「性／別研究的中國轉向」，在這本書的第八章我們談論家庭、父權、動保等，並且把Christopher Lasch這個並非進步或激進的思想者當作資源。在這本書的〈結語〉中，我們批判「親密關係的民主化」這類情感溝通的主流話語。總之，我們意識到過去所認同的激進派思考陷入困境。當然，思考思想的不足和實踐效果之間不是因果關係，我們的知識思想就算是真理，也不能保證我們在公共場域的實踐後果，因為影響實踐後果的力量或作用者很多。講的通俗一點，評估思想和評估行動後果是不同的。總之，評估我們的實踐後果需要的是另

外一套社會歷史分析。同樣的，我們的話語怎樣被挪用，和我們的知識思想的不足或正確較少關係，這也是很明顯的。這些都需要另外的分析，且擱下不談。

《民困愁城》之後，我受到一些台社（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同仁所組成的讀書會影響，主要是在知識上有一些反省。我們這些人1980年代在美國受教育，那時候美國人文學界開始「理論轉向」，就是向1968後的歐洲流行思潮取經，各種各樣像是後結構、傅柯等統統跑出來，我們帶著這些東西回來台灣。1990年代台灣開始學院專業化的浪潮，這個專業化浪潮到了最近十年左右，改變最大的就是西方的知識生產逐漸能夠控制台灣的知識生產。例如你的台灣做學術研究，要接合西方的問題意識和理論資源，你不能自己山寨亂來，你台灣的同行會知道你亂寫或者以翻譯代替著作，你最好投稿西方的期刊等等。而我們這一代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都幫忙打造了台灣的知識專業化，強化了西方的知識體系。現在整個西方的知識體系核心就是西方的現代性，而且西方現代性就代表了普世價值；很多時候我們有一種幻覺，就是西方現代性揭示的那些道德理想就是人類最高價值。我們有這樣的一種歷史的傲慢，就是我們的價值意識已經站在人類歷史的最高點了，例如現在有誰說同性婚姻不是最終的道德真理呢？現在我們只是在等待那些文化意識上更保守的人改變自己。即使西方現代知識體系或理論不符合我們社會的現實，我們也覺得這是我們不夠進步或現代化，我們就是要用西方的知識理論來改造我們的現實。

從1990左右開始，反西方中心論和後殖民逐漸成為人文知識界的顯著發展，這和亞洲四小龍以及亞洲的崛起是有關係的。當時很多人就希望我們的知識要建立在本土經驗上，但是我們都知道，台灣未必能夠解釋台灣，對吧？因為發生在現實裡的本土經驗，它的源起可能是在很遙遠的西方或是很遙遠的過去，所以你要把知識解釋侷限在台灣有限的時空裡面就是造成趙剛所謂的「方法論的台獨」；這樣的知識生產只是灌注於本土經驗，只從這裡去尋求非西方中心論的知識生產，是沒有希望的。打個比方，你們知道貨櫃吧，大陸叫做集裝箱，我們的知識生產不能只灌注在台灣這個貨櫃裡，這是按照眼前的政治

疆界與限制在做學問，而且這個知識裝箱還故意把金門馬祖南海都排除在外。所以我們不但要去看其他貨櫃，也要超越這種貨櫃形式，因為這是西方現代國家系統對知識生產的限制。例如，我們能把琉球放到日本的知識生產貨櫃裡裝箱嗎？陳光興講過「亞洲作為方法」，他提出許多不同於美國西方現代性的參照點，而且也參照了亞洲的現代化道路。總之，我們最初是想把「去西方殖民化」的性／別研究建立在本土經驗上，特別是這個本土的邊緣，但是又發現這個本土邊緣的不足。除了其他第三世界的本土外，我們還必須走向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我們必需要有這樣的努力，這就是丁乃非研究婢妾歷史的重要意義。

我們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知識生產當然有很強烈的政治性，我們要去建立性／別研究的在地化，但是我們背後的批判理論其實是受到當時時代氛圍的制約影響，我認為我們就是美國1990年代左派或是批判學術知識份子的思考方式。1990年代那個時候是新自由主義抬頭的時候，冷戰結束了，美國單邊獨霸的時代開始了，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破產，這個時候批判知識界剩下什麼選擇？你不可能再去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已經破產了，你也不可能打倒美國，美國強大的單邊獨霸到現在看起來還沒有衰落，所以我們只能永遠激進反抗，永遠站在邊緣這邊，這就是這些批判激進知識份子的自我定位，我們要永恆地站在社會底層和邊緣的位置來對抗國家，對抗資本霸權和它的主流文化。這就是我們。

當時我們都看不出來這種思考有什麼問題，然而在這樣的思考下，很多問題的研究根據都是西方經驗或者西方目光，缺乏非西方中心論對西方或非西方歷史經驗的解釋深究。很多時候我們就很單純地被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情緒所感染，封閉了許多問題的知識道路，所以我們知識上的漏洞其實是很多很大的。以上是反省自己的求學之道，應該說反省得太晚了一些。大家可能注意到這次研討會我研究晚明男色小說，雖然像這樣的轉向遲了一點，不過我覺得晚開始，總比不開始好。所以我也用我個人的覺悟來勉勵所有對知識追求還執著的年輕朋友。

王 蘋

我不是中央性／別研究室的成員，我是搞運動的，就是所謂的實踐者，何老師同樣給了我這個課題，讓我參與性／別20年的反省。我的課題就是丁乃非那個題目，就是我們要面對自己的失敗。

如何面對自己的失敗？

搞運動的人要談失敗，那是情何以堪！如果可能的話，如何面對過去以便修正自己的錯誤，這樣的方向我還是非常同意的。但是一開始想，就知道20年的時間很長，想著哪裡沒做好，就開始有點活不下去了，壓力非常大，包括之前喀飛提到那個孤獨的感覺，我的孤獨感可是跟著我幾十年了，也都是自己在消化，蠻辛苦的。我後來就發現，年紀還對我有點幫助。剛剛丁乃非講掙角度，掙角度的年代我跟丁乃非可都還沒30歲啊！（聽眾大笑）我跟喀飛搞第一屆台北同玩節的輝煌歷史時，當年我都還沒40歲呢！這是13年前的事了（聽眾大笑），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要來面對還蠻辛苦的。但是我發現我得先做一件事，就是要回答一個對我自己而言很重要的問題：「我到底是什麼？」而面對這個問題，我最想講的一句話會是什麼？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

在婦運組織裡我是全職的工作者，真的是非常投入的全職工作者，然後被迫離開婦運，進入性權運動，以被大家廣為熟知的同運份子身分去回顧這幾十年，我從來不覺得有什麼好榮耀的，常常回頭看看，真是一事無成。所以也許這種回顧不是我們做了什麼豐功偉業，重要的是我們改變了這個世界什麼，以及我是怎麼被世界看見的。我要從一部電影開始講起，就是「驕傲大聯盟」，片商曾經發給台灣同運組織一封公開信，信上說「驕傲大聯盟同志議題遭到美國抹滅，影音產品表裡不一致，惹爭議」。這部影片講說1980年代英國同志和礦工之間兩股勢力彼此結盟的溫馨故事，但是因為劇情涉及同志議題，導致該片從英國來到美國之後變調，遭到當地不公平的發行待遇。美國日前發行DVD的時候修改了外殼封底使用的遊行劇照，上面應該有「男女同性戀支持礦工」的標語，DVD正式在美發行的時候就沒有了

這個標語，被修掉了。發行商說，這個電影來到台灣以後受到很友善的對待，片商保證標語會原封不動被各位看到，然後廣邀大家去看電影。我也去看了，也很感動。新聞稿也提到，發行商的文案劇情簡介原來有寫「倫敦一群同性戀積極份子」就被刪除，變成「倫敦一群積極份子」，同性戀就不見了。這時候投資這個電影的英國基金會的主管就說：「我真不訝異美國的經銷商想透過這種淡化同性戀色彩的方式增加產品的銷售量」，這是考慮到商業價值嘛！然後他說：「LGBT就跟〈斷背山〉電影一樣，是一個被嚴重邊緣化的題材」，聽起來非常為同性戀說話，然後這部電影的導演也站出來說：「改變封底真是太笨拙了，而且是愚蠢的，因為這是一部要被所有不同政治派別以及不同性取向的人熱愛的電影，希望更多觀眾可以看見它。」

這個電影當然提供了一個劇情簡介。文案說，「1984年英國首相鐵娘子柴契爾夫人實行新法，削減勞工權利，各地工人決定發起大規模的罷工來對抗政府。一群男女同志同情礦工處境，認為他們和自己一樣都是弱勢族群，因此決定發動募款來幫助礦工。傳統又保守的礦工對這群伸出援手的同志們感到困惑、甚至抗拒，他們之間能不能摒棄成見，攜手結盟呢？」這是一個多感人的故事！同志跟礦工要攜手結盟！我看了電影，心裡有一個很大的困惑，所以我回去就搜了一些資料，我看到一篇文章，電影出來的同一年有一個人寫了一篇文章，原來他是那個主角Mark Ashton的朋友，也同時是故事裡那個Lesbians and Gays Support the Miners組織的一員。他的文章也是讚揚這部電影，然後也期待更多人可以看到，可是他還說了一段話非常刺激我。那段話是這樣說的：「這部電影確實開啟了很多櫃子，但是在開啟櫃子的同時，有一個櫃子沒有開，這個櫃子是什麼呢？就是這個男主角是什麼。」

這跟我講的「我是什麼」有點像。其實這個男主角Mark是當時倫敦當地很重要的的一個共產黨組織的成員，他的身分是「青年共產聯盟」的執行長，可是這個訊息完全沒有在電影裡被呈現，如果各位去看這部電影是看不見這個事實的。在電影裡會看到同志和礦工之間的連結就是同志扮裝跳舞，礦工阿公阿嬤看了就目瞪口呆，對於男同性

戀怎麼做愛、女同性戀怎麼做愛就好奇，然後彼此很融洽地就在一起了，電影也沒有描述那個礦工公會的負責人的背景。問題是：為什麼這兩個工會甚至工會的組織者會聯合起來？他們當時是在怎麼樣的左翼社會條件之下，怎麼樣的社會主義環境之下，才有這樣的聯盟？這個訊息對我來說很重要。

後來我又連結到另外兩件事情，兩個最近過世的人。去年一位重要的小說家、跨性別運動家費雷思過世了，費雷思的過世我們也很關心，因為他過去曾與我們直接關連過。我看了他的親密伴侶璞蜜妮為他寫的追悼文，裡面提到了費雷思說自己的話：「費雷思認同自己是一個反種族主義的白人、工人階級、不行猶太教禮俗的猶太人、跨性別、女同志、女性，以及革命共產主義者。」璞蜜妮的文章裡表示，費雷思最後的遺言是，希望以一個「革命共產主義者」的身分被記得。我看了很感動。還有一件事，今年施寄青老師年初過世了，因為過去跟她算是舊識，有工作共事的經驗也有生活上的一些接觸經驗，我就協助甚至是推動了為她辦的告別式，不想她就默默地這樣離開。但是我不可能去辦告別式，因為我跟她沒有任何組織的關係，我只是很敬仰她，也受到她一些影響，所以就促成了晚晴協會做為主要的主辦單位，然後還有其他一些婦運組織，去為她辦了一個告別式。在告別式的現場我有一種很痛苦的感覺，不是施老師離開我們，而是我在想：「天啊！人離開的時候，要怎麼樣被人家看見？」如果自己不能為自己說話，就這樣了耶！

那天上去講的人當然有些人講的我是很感動，有些人講著講著，我就想：哇，施寄青是那樣的一個女人啊？倒不是說講了什麼八卦讓我驚訝，而是她的重要性，她改變了我的重要性，她對於台灣婦女運動、性別世界的撼動，這些部分都沒有辦法被提，因為上去講話的人根本不認為那些事情是重要的！我真的還蠻焦慮的。過去我參加過一些跨性別朋友或是同志朋友的葬禮，看到布條上面寫著什麼「鳳去樓空，繡幃香冷」，以及家長出來說「我的女兒如何如何」，我就想，「天啊～我認識的根本不像個女的」，可是他已經「被」穿上小鳳仙裝，躺在那裡了。我的意思是說，你的性別身分的被誤讀或是不被尊

重，我們是很不舒服的，但是我覺得你的革命事業沒有好好的被尊重，我也是很不舒服的。

我要講的就是從這裡開始我就覺得「我是什麼」得趕快找機會講清楚。雖然今天不是辦告別式（聽眾大笑），我很健康，我們的運動在性／別20年之後還要持續地往前開展，各位不用太擔心（聽眾大笑），但是我得面對我的自覺歷史。

我是被好好的養成的，很年輕的階段就被養成了什麼事情都不懂卻自以為是的一個了不起的專業者，然後莫名其妙跑到美國去念書。當地左翼的知識份子們好好地培養了我，讓我能從一個完全沒有意識的狀態，從白紙染黑。我覺得我能夠被染黑是因為我真的夠白（聽眾竊笑），一染就黑，現在回想這個染黑的過程，那段時間還真幸福。遠在掙角度之前，我有好好地被左翼培養，我是身上帶著左翼培養、吸著左翼奶水長大的，那個經驗對我來說天翻地覆，我的位置也就挪移了，我就不可能再搞專業了，所以我研究所也沒畢業就跑回台灣，認真地要效力，比現在所有要組黨的人都還要熱情澎湃。當年還參與了勞動黨、工黨的成立，不諱言地講，當時他們的黨旗製作我也幫了忙，因為我是有一點美術基礎的。還有一件小事情，我跟丁乃非當時一起回台灣，租了一個大貨櫃，放了非常多書籍，然後有一箱書被查扣了，蠻尷尬的，那箱書裡面有一些是從左翼的觀點去看婦女的問題，很可惜是裡面還有一本小紅書《毛語錄》，就是因為那本書，我們那箱被查扣，所以我是那個年代回來的，很惋惜。

到台灣之後參加工運，理所當然，那是我非常認真要做的事情，雖然不是重要角色，但是全心全力。後來進入婦運也是理所當然，因為我認為要進去蹲點，掙角度是一個非常有企圖，要組織女學生的進步力量的一個組織，那些女學生組織也多少參與了工運，甚至下鄉。但是同時在掙角度的過程裡我大量的閱讀，雖然有丁乃非剛剛講的方向，但是也讓我產生了對自己身分的重新覺醒，動搖很大，於是我的生命開始不同，人麻煩也在這裡，我就被女人所吸引，慾望被打開，因為我要解放，於是我就真的解放了（聽眾大笑），就真的變成女同志了。

在進婦女新知工作的同時，我是帶著這種左翼的觀點、帶著階級意識進去工作的，所以當有女工議題的時候我覺得這絕對是我們要站上的第一條陣線。但是我必須說，因為女工的議題，我跟婦女新知董事會有非常大的衝突，還曾經有辯論過，第一篇聲援新竹新埔紡織廠彭菊英因抗拒性騷擾而被解雇案的聲明是我寫的，但是裡面被改了字，董事會刪掉了一些覺得不妥當的字眼。我當時就懷疑，我在這裡蹲點會成功嗎？但是因為長期社會化的教養讓我是一個非常溫順、溫暖、散發光芒的人（觀眾大笑），所以我在新知也很快樂，因為她們很愛我，我對她們也很好，我慢慢地也就滲入了「姊妹團結力量大」的想像，非常認同我的工作。

我其實是一個大矛盾體，我帶著我想做的階級解放運動進去蹲點，然後我又開始認同了女人之間團結力量大，然後我又愛女人，所以就混成一團，情緒非常地高漲。但是沒辦法的是，你已經有一個認同的時候，你會跟人在很多議題上產生很大的衝突，階級只是其一，還有其他的弱勢議題，包括像愛滋、代理孕母、性工作，於是就砰砰的連續大爆炸，最後我就被炸出來了。離開婦女新知的時候，我當時意識到婦女之間是不同的、有差異的，可是我沒理解到婦運已經開始窄化了，我沒有意識到那個嚴重性，我的意識沒有展開，我太追逐個人的自我成長。此刻回頭看我的組織工作，我覺得是失敗的，在改變運動上，我覺得也沒成功。

接下去，我就開始更快樂地做性權運動。但是在同運現場，伴隨著自己繼續的自我認同，過去沒膽承認自己是什麼，等到進了同運就開始說我可以開始學著做自己了，我的性別認同這塊就越長越大，我覺得不能再隱藏了，我要勇敢地說出來我是什麼。這個時候主要的戰役就放在對抗異性戀的霸權，但是與此同時也就開始限縮了自己的運動取向，只做這件事，只在同志之間找尋彼此然後獲得溫暖。

婦運時期看到是生理性別的壓迫，同運時期也看到性認同的壓迫，但是運動搞到現在，婦運裡面看到女人就是要平等，而同志就是要愛（聽眾竊笑），那我要怎麼看我的失敗？我覺得我沒有開啟一個對社會的想像和對話，我自己困在認同的困惑中摸索前進，我在運動

內部沒有清楚地現身做為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個共產主義的追隨者，我也沒有去挑戰大家對社會本質的一些對話，階級觀點我自我也模糊。

剛剛丁乃非也提到冷戰，卡維波也提到類似的東西，在一個左翼斷層的台灣社會中很孤獨，我覺得我在生活中產生了惰性，也在生活中失去了勇氣。兩個字啦，一個懶，一個孬。未來有課題在前面，這幾天的會議我在聽，主流的性別建制越來越強大，我們跟主流性別建制會是怎麼樣的關係？我覺得這必須是共同抵抗的，但這個共同抵抗要有一個基礎，在座的我跟各位，我們是不是有共同的基礎去共同抵抗？我覺得我們必須要開始一個不一樣的對話，一個對社會的想像的對話，而不只是侷限在議題本身。謝謝。

何春蕤

性／別研究室的會議就是不一樣吧！（聽眾掌聲）我們其實不怕討論我們自己覺得沒做到什麼，至於我們做到了什麼可能你們自己也看得到，因為已經拿在手裡、放在腦筋裡了，但是我們沒有做到的，我們自己很深刻的在這個20周年的時刻回頭看。我們也不希望大家只是在這裡聽了八卦，我們其實希望示範我們一貫的態度，就是對我們所做的事情深自反省。我們願意去思考我們的侷限，願意討論我們為什麼會這樣的侷限，這也是我們今天準備這場對話最重要的目的。如果說性／別曾經做過什麼，或者沒做成什麼，我們自己的分析是什麼？我們覺得到底是少了什麼以致於沒做成？在一個不斷慶讚性別政治成功的年代，我覺得我們需要有這樣一個空間，能夠回頭去看看自己的思想從哪裡來？我們受到了什麼力量的影響？我們曾經想過什麼？為什麼沒有做成？又做成了什麼？為什麼能成？現在有怎麼樣的局勢變化？我們希望能夠留下一點點我們對於自己、對過去、對現在局面的分析。大家對我們20年的存在有什麼想法，也請和我們分享。

【朱玉立獻花，敬性／別的世代】

問題與討論

郭彥伯：我覺得這兩天聽下來有一個被反覆提出的問題，面對所謂西方或是外來的理論，學習者要怎麼讓它在地或是落地的問題，但是既然要反對政治正確，這件事情也不可能成為一種律定。從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它其實早就是一種規則或律定，用西方或是外來的理論來互貼標籤攻擊這件事其實一直是所謂後進國的不同知識立場在否定彼此時的說法。以一近一遠來說，當年國共還未分裂的時候，蔣介石也是這樣，同時批評自由主義或是共產主義是外來的理論，而他主張的所謂在地又是什麼也沒說；另外近期後進國家的知識份子辯論也被說是超英趕美，複製西方的吵架。關於這個問題，如果不要變成一種簡單的政治正確，我想到兩點，就是西方的標籤本身會不會變成一個陷阱？這兩天一再提起劉人鵬老師研究的一些晚清民初的思想，那些思想家其實都同時閱讀又引介非常多西方理論，他們所做的知識生產也常被理解成只是西方的東西。以嚴復為例，他翻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的時候，把「自由放任」扭轉成是中國的如何「富國強兵」，我們可以說他是在套用或挪用西方理論時犯了錯誤，但是同時也可以理解成他在展現一種所謂當時中國歷史情境的情勢和在地性。第二個我想回應就是，我覺得在今天一些討論裡面大家也看得到反省和批判往往和運動割裂開來，比較善意一點的說，它會變成是運動的一種修復和補縫，負面的表示就是風涼話或不理解。但是我常常覺得，我雖然同時參與過很多社運，但是批判跟反省才是我花最多心力和挑戰最多的事情，也是最費力的。當然每個人的選擇有點不同，但是我今天比較想強調，我覺得反省和批判本身就是一個運動。我特別喜歡剛剛丁乃非老師講的東西，我覺得從一個角度來講，那些反省——譬如說那個話語怎麼樣被扭轉？在冷戰的情勢下這些話語在台灣現在還有什麼效果？大概還很難直接變成現

在運動可以挪用的，不是馬上就可以指出一個方向的——可是我覺得這些反省的出現本身應該被當成一種運動來對待。所以我期待在 20 年後的今天這些反省做為知識本身的運動可以繼續走下去，像是回憶錄這樣的東西也都可以是一種鬥爭。

何春蕤：謝謝你的期許。

卡維波：非西方中心論或反西方中心論當然有可能被庸俗化，尤其是在西方現代性剛剛開始進入非西方世界的時候，當時都會聽到人說：你們怎麼用西方來談論、來指導、來改造我們社會，我們不要西方的東西。不過我也要提醒，當時的人能清楚直接地看到西方現代性的野蠻、暴力和強權，雖然現在這些仍然都存在，但是卻被電視新聞和電影隱藏起來了。當時還有的反應好像是很可笑地反對現代化，但是如今我們也知道像甘地的反現代有他很深刻的在地考量。無論如何，非西方中心與反西方中心經過至少一兩百年的積累，現在立於不太一樣的知識基礎上，像新世界史，還有大陸學者們的努力等等。有時你們聽到的是一些很庸俗化的說法，不過我們的論述不是建立在這上面。（註：可參考卡維波，〈「在中國（派）作為理論」之前〉，《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16 年 3 月號）

黃若曦：我想做一點分享。我在新竹的一個同志中心上班，其實這個同志中心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因為我自己本身對性別議題比較有感觸，但是在這樣的體制下，其實我們在做事的時候常常會有矛盾，就是經費給的並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我想要做的在這體制下可能會綁手綁腳，可能有些活動並不成功，可是我還是想要繼續做下去，所以我常常會有很多矛盾，會覺得怎麼會是這樣子。可是今天聽完台上這些老師的想法之後，我覺得有時候這條路很痛苦，學會反思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這是我最近的體悟。我在實務工作上其實沒有任何

理論基礎，因為我本身不是讀性別專業的，我也開始準備想要去念性別，但是沒考上研究所，反正就是經歷了各式各樣的失敗。各位老師的想法讓我非常的感動，我覺得也開了一扇窗，讓我可以往其他方向去思考、去認知如果我想要繼續做這件事情的話，該如何去支持我的心靈，然後再去往其他方向找資源給在地的同志朋友們。我覺得這個同志中心可能成立的立意不完全是為了同志族群好，可是還是會有一些工作人員想要為這個族群做事。謝謝老師的分享。

何春蕤：順便告訴你一下，台上沒有一位老師在做學生的時候是主修性別的（聽眾大笑）。更有意思的是，即使我們現在已經寫了 20 年跟性別相關的論文，做了跟性別相關的學術研究，甚至出版性別的學術專書，我們在申請成立性別研究的碩士班的時候，竟然也有評審否決我們，說我們沒有一個人是性別專業的（聽眾大笑）。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一個再生產的系統，我們「被」絕了後。不過我倒希望今天的會議是我們生出眾多「野種」的時刻。

賴麗芳：我是中央英美文學所的賴麗芳。我有要感謝的，可是我覺得這個時候不是要講感謝，我自己在思考，不管在自己的位置上或自己現在在從事的運動裡，目前建制化所帶來的一些效應都出現了。我現在面臨比較大的問題其實是整個社會包括運動裡都提出來的友善訴求：友善的空間、友善的環境、友善的校園，整個是扣在一起的。我想要問王蘋，因為在同玩節之後其實同運有一個走向，陳韋禎有一篇論文把這個現象爬梳出來，說兩千年其實是一個蠻關鍵的點，同運其實在那個時候的走向已經朝向比較溫暖的、溫情化的訴求。王蘋剛剛也有提到自己在位置上有一些個人的情感交錯，然後就會影響到在運動裡面你怎麼樣做判斷和做考量。那時候那樣的時空背景之下可能大家會覺得友善空間是很重要的，所以需要社會大眾或是國家給資源、給空間，會有這樣的訴求出現

。可是現在來看，一直提這樣的訴求也已經有一些效應出來了，「友善」已經變成是規訓，「性別平等」也是一種規訓。我不知道現在王蘋在運動的位置上會如何思考這個問題。

王 蘋：你提到性別友善，我可以提另外一個東西讓大家對照一下。我覺得性別友善確實出了很大很大的問題，因為我們根本沒有改變社會的建制或是撼動社會對於性別的想像，我們就只說性別友善，它造成一個很好笑的效果。之前選舉時我們弄了一個「開開團」，我在開開團裡獲得很大的成長，因為我發現終於可以去談被選舉人要負責任這件事情了。當時開開團提了性別友善或友善廁所作為議題，可是很快就會被別人拿來用，它就變得很政治正確。然後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效果，我們說性別友善就是要「去性別」，就是對性別說「去你媽的」還是「去你爸的」（聽眾大笑），也就是說，不要性別，就是性別友善啦！可是現在性別友善不是這樣，現在性別友善廁所就是男廁、女廁、加上性別友善廁所（聽眾大笑）。以前是男廁、女廁、殘障廁所，殘障廁所還會加上親子廁所的名稱，然後再有個好聽的名稱叫多功能廁所，現在就變成是性別友善廁所了。〈身心障礙法〉不是說要有殘障廁所嗎？現在就是換一個名稱，對有些人來說，性別友善就是這個樣子。之前在跟跨性別朋友討論的時候就發現，會造成一般人說「我不要在男廁女廁看到他們」，要他們去特定的地點上廁所。你沒廁所上，我給你廁所啊。這種友善結果出來的就是完全不撼動社會、不改變社會對性別的想像。另外，其實我也不是說以「階級」為唯一的想像，但是絕對不會只有性別是壓迫的唯一可能。我覺得帶著階級視野的開展，我們才可能比較唯物的、深刻的、徹底地、不懼怕地去解構家國、人際、資源，我們才有可能重新定義什麼是集體、什麼是關係、什麼是伴侶。這是我的意見。

何春蕤：對於賴麗芳我也有一點點回應。對我來講，現在比較大的工

作是對這些普世價值進行重新的、仔細地檢驗，例如「友善」到底在實踐中做了什麼？這個友善的實體是什麼？而不是只是講這兩個字。又例如「平等」，我最近感覺到，在性別平等的場域講平等，很多時候就預設了一對一的關係，我沒有外遇，所以你也不能外遇，這樣才平等。也就是不可以有「多」，因為不可能說：你可以有三個伴，我也可以有三個伴，這樣我們就平等。性別平等絕不容許這種事情，一定是一對一的。所以說，這些偉大的普世價值背後都有一些隱藏的、規範的限制，都還沒有被我們在實際的運作場合裏面把它挖出來。賴麗芳在校園裡時時注意到很多友善的操作，這是非常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其他還有很多很多現象需要各位在你們生活環境裡關注普世價值如何運作，這些都需要一一的檢驗，而這個工作才剛要開始。

[逐字稿人員：陳思瑀]

